

〔日〕浅井加叶子 著

王国勋 刘岳斌 译

当代中国扫盲考察

当代中国出版社

〔日〕浅井加叶子 著

王国勋 刘岳斌 译

当代中国扫盲考察

当代中国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中国扫盲考察 / (日) 浅井加叶子著; 王国勋, 刘岳斌译. -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9.4

ISBN 7-80092-813-6

I. 当… II. ①浅… ②王… ③刘… III. 扫盲 - 普及教育 - 研究 - 中国 IV. G7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6618 号

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三河市东方印刷厂 新华书店经销

787 × 1092 毫米 32 开本 6.125 印张 2 插页 130 千字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9.80 元

前 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中国气象一新，开始了国家的建设。这个时期，教育方面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如何面向群众这一课题。

这时的中国人民，心中都燃起了新的希望，嘴上唱着《识字歌》参加到扫盲教育活动中。经过了数次的扫盲活动，将“文字”逐渐变成了人民群众自己的工具。

然而，建国50年后的今天，扫盲工作并未得到彻底的解决。改革开放后第三次颁布有关扫盲的法律，更大声势地倡导扫盲活动。

中国为什么迟迟未能解决这一问题呢？将来又是否能够解决呢？今天，中国初次尝试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对扫盲工作会产生哪些影响呢？这些正是写作本书的目的所在。

第一章对新中国建立以后的成人扫盲教育工作进行历史性的回顾。这部分主要对建国初期、“大跃进”年代、调整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五个时期的扫盲教育分别加以论述。

第二章就当代中国扫盲教育政策，分别从政策出台背

景，政策、方针的内容，普及初等教育，成人扫盲教育，扫盲后的继续教育等方面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其政策的重点和政策的目标进行分析。另外，还从行政机构、行政制度的特点、财政等角度对扫盲教育行政工作分别加以论述。最后，对扫盲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从教材的内容和教授形式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在第三章，重点放在文盲的现状。在八个方面分别加以论述。1. 各省市自治区的地域差异；2. 省内的地区间差异；3. 各年龄段之间的差异；4. 市、县、镇中文盲的分布；5. 在业人口中文盲的分布；6. 非就业人口中文盲的分布情况；7. 收入与教育水平；8. 婚姻、生育与文盲关系。然后，从文盲形成过程的角度，将学龄儿童失学、青壮年扫盲工作困难等诸原因和扫盲后的继续教育工作等方面分别加以分析研究。

第四章就扫盲教育的成果和课题，从总人口中的文盲人数和文盲率的减少、来自国际社会的评价以及今后的课题等三个角度加以考察。

此外，由于中国解放后的各个不同时期扫盲教育的对象，即文盲的定义也不相同。因此，如没有特别说明，文盲一般指青壮年文盲。

责任编辑 黄昭仪 (特约)

封面设计 李 姮

版式设计 高 歌

责任校对 王兰英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建国后扫盲教育	
历史的回顾	(1)
第一节 建国初期的扫盲教育	(1)
一、扫盲教育体制确立的背景	(1)
二、扫盲教育体制的确立	(8)
第二节 “大跃进”年代	(11)
第三节 调整时期	(18)
第四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	(22)
一、前期：1966—1969 年	(23)
二、后期：1970—1976 年	(28)
第五节 “文化大革命”之后	(35)
一、“文化大革命”后至改革 开放	(35)
二、改革开放以后	(37)
第二章 当代中国的扫盲 教育政策	(51)
第一节 扫盲教育政策	(51)

一、扫盲教育政策形成的背景 及其特点	(51)
二、扫盲教育政策的宗旨	(62)
三、初等教育、扫盲教育和脱盲 后的继续教育	(62)
四、扫盲教育政策的重点	(64)
五、扫盲教育政策的目标	(65)
第二节 扫盲教育的行政工作	(66)
一、扫盲教育行政机构	(66)
二、扫盲教育行政制度的特点 ..	(71)
三、扫盲教育的财政体制	(82)
第三节 扫盲教育的内容及其教授 形式	(84)
一、教材内容	(84)
二、教授形式	(88)
第三章 文盲的现状	(95)
第一节 文盲的分布	(95)
一、全国范围的地域间差异	(95)
二、省、直辖市间的地区差异 ..	(96)
三、各年龄层的差异	(100)
四、市、镇、县中文盲的 分布	(103)
五、在业人口中文盲的分布	(104)
六、不在业人口中文盲的 分布	(108)
七、收入与教育水平	(111)

八、婚姻、生育与文盲	(111)
第二节 文盲的形成过程	(116)
一、学龄儿童失学的原因	(117)
二、青壮年扫盲工作困难的 原因	(125)
三、脱盲后的继续教育	(135)
第四章 扫盲工作的成果 及课题	(147)
第一节 总人口中的文盲人数的 减少和文盲率的降低	(147)
第二节 可喜的成果	(148)
一、青壮年脱盲地区的扩大	(148)
二、农村初等教育的普及	(148)
三、妇女扫盲的成果	(149)
四、青少年的志愿活动	(149)
第三节 国际社会的评价	(150)
第四节 今后的课题	(151)
图 表	(154)
后 记	(186)

第一章 建国后扫盲教育 历史的回顾

第一节 建国初期的扫盲教育

一、扫盲教育体制确立的背景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衰退，文化、教育科学水平也都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总人口为 5.5 亿，其中 80% 以上为文盲，农村的文盲率高达 95% 以上，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只不过 20% 左右。就在如此落后的文化背景下，新中国开始了国家的建设。^①

新中国成立时，国际形势正处于东西方冷战的紧张时期。当时，全面振兴国民经济已成为燃眉之急。

基层干部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工人是现代工业的生力军。然而，他们当时的文化水平却非常低。因此，要使他们能充分理解党的政策、响应政府对国内外问题所作的具体决定，就必须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提高识字率）。这已成为当时堆积成山的诸多课题中的首选课题之一。

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期，从整体上看，扫盲在教育工作中占有中心的位置。由于政府充分地利用了

人民公社的动员机制，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提高识字率的最佳时期。

现将建国初期扫盲政策及效果概述如下。

1949年12月教育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②在这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从1951年开始进行全国规模的扫盲运动。

1950年6月1日政务院下发了《关于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指示》^③，要求以工厂企业的工人为对象，进行扫盲教育。另外，教育部在1950年12月21日公布了《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④，将千字左右的识字量定为农民教育的目标，使他们能够阅读初级水平的书籍报刊，具备初级的计算能力。

1950年9月20—29日，教育部与中华全国总工会共同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⑤毛泽东、朱德、董必武、郭沫若等国家领导人以及470名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说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非常重视这项工作。这次会议强调工农教育的实施对象首先是工农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其次才逐渐面向那些条件具备的广大工农群众。

1951年3月1日《学文化》杂志创刊，这是全国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的机关刊物，由教育部主编。它主要面向识字量不多的职工。^⑥在识字者还不很多的状况下，政府创办这样的杂志，本身就说明了政府对扫盲教育的重视。政府的重视并非只限于形式，而是真正地深入实际去抓扫盲工作。在扫盲教育的初级阶段，这些措施对巩固扫盲成果起了重要的作用。

七个月后的1951年10月1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根据这个决定，在扫盲学校对失学青年和成年人进行扫盲教育。因此，扫盲教育被纳入到了正规的学制中。这不仅意味着工农教育已在正规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时它还说明扫盲教育已成为这一时期教育工作的中心。

根据教育对象不同，工农教育分为工矿企业工人教育、干部教育、农民教育三类，分别由工会、文化部门和教育部门负责。各个部门都设立了自己的专门学校。工会有工人业余学校，文化部门有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教育部门有农民业余中小学等。^⑦

1952年，实施了扫盲教育的新教授法“速成识字法”，并在全国推广。“速成识字法”是由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的文化教员祁建华发明的。这种教授法要求学习者首先将汉语的注音符号记住，然后，再通过扫盲课本进行读写会话练习，利用拼音作为“拐棍”，大量突击学习生字和生词，提高识字能力。大约在250小时的课堂学习和在家自习后，可以记住1000个汉字，可以阅读一般的读物，能够写200—500字的短文。^⑧尽管这种识字法有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各地只追求学习进度而使学过的知识得不到巩固。在1952年秋便开始出现了“夹生”和“回生”现象。

针对这种情况，政务院和教育部在1952年下半年到1953年这段时间里召开了几次会议^⑨，并下发了通知，要求制止文教工作中出现的“急躁冒进”、强迫命令和形式主义等作法。

1952年11月15日，随着政府机构的改革，设置了中央

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下设办公厅，城市扫盲工作司，农村扫盲工作司，编审司等部门。

1953年，扫盲工作委员会又编纂出版了《扫盲通讯》杂志^①。1951年发行的《学文化》刊物的特点是只面向一般文盲，强调在扫盲教育中学习文字。而这本《扫盲通讯》却更面向扫盲工作者。《扫盲通讯》的发行是对各级领导和机关进行更具体、更详尽指导的一个尝试。到此为止，由于“速成识字法”教授的具体步骤存在缺欠，人们由于对扫盲工作的要求过高过急，从而产生了盲目冒进、强迫命令和形式主义等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央政府自身就想尽早地完成扫盲教育工作，为国家建设早日培养出人才。同时，把扫盲教育工作考虑得过于简单化，而对基层教育行政工作缺乏具体的指导等等。在对人民群众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具体的组织建设和对扫盲教育工作者的具体指导是非常必要的。

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的设置就是这种反省的结果。《扫盲通讯》的创刊以及后来不久在11月24日发布的《关于扫盲标准、扫盲班毕业考试等暂行办法的通知》，对扫盲工作的指导更具体化。在该《通知》中，第一次将扫盲对象进行分类。对象不同，识字量的要求也加以区别。例如，要求干部和工厂的工人识2000字，能读懂一般性的书籍和报刊，并能写200—300字的应用文。城镇工人和市民的识字量要求为1500字，其他方面的标准与干部和工厂工人相同。要求农民识字量为1000字，能阅读一般性的书籍、报刊，能写必要的书信和收条。另外还第一次设定了“半文盲”，其定义是“识字量在500字以上，但还没有达到脱盲的标准”。同时还具体规定考试分为“识字”、“阅读”、和“写

作”几个内容来进行。

这个时期的扫盲运动的实际情况如何呢？学员们在扫盲后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下面举几个例子来说明。^①

北京市郊外石景山区的扫盲状况。

这个地区的扫盲教育是使用 1952 年全国推广的祁建华创造的“速成识字法”来展开的。扫盲教师主要来自：受过基础训练的成年人；小学教师；小学高年级学生和已经脱盲者；解放前毕业的大学生等。也有请解放前的私塾先生当扫盲教师的例子。教师在进行识字教育前接受政府组织的集训。集训的重点是扫盲教育的意义及其他注意事项。然后，根据学生现有水平编成不同的班级（初级、中级、高级）。授课场地，除了使用小学的教室外，大一些的村子还利用村里的办公室。因为学校赶在冬季开课，所以人们将其称为“冬学”。在第二年开春后又改为“民校”，一年四季都上课。晚上授课 1—2 小时，参加学习的学员全都是年龄在 20—30 岁的农民，女性占较大的比例。识字班的学员们经过 3—4 年的学习，多数都在初、中级水平，但高级班的毕业生并不多。学习比较好的后来都成了农村干部。有的年轻人，经过考试从事了出纳和会计工作。也有少数人继续学习，升入高一级的学校深造。

姬凤琴，女，当时 20 多岁。解放前只上了半年的学。1951 年参加了政府组织的扫盲班。白天在田里干活，晚上在扫盲班学习一两个小时，包括每星期天都上课。小学老师和小学高年级学生当扫盲教师。刚开始上课时，还没有教材，后来才用了课本。经过三年的学习，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都毕业了。初级班和中级班的毕业考试只考“阅读”

和“听写”。高级班的考试是在考卷上作笔答。毕业后，作农村信用社的会计。

刘玉田，男，当时 27 岁。参加识字班之前，斗大字不识一个。1952 年参加学习。每天学习 1—2 个小时，冬闲时更多些。老师 40 多岁，以前是村里的私塾先生。初级班使用 500 个字编写的课本，中级班用 1000 字的课本，高级班的考试有作文（如写信等）。高级班毕业后担任农业合作社的副主任。有个年轻人经过刘的劝说，也参加了扫盲班的学习，毕业后升入初中，成了工厂的工人。

马淑兰，女，当时 22 岁。解放前只上了一年小学。1952 年参加了扫盲班的学习。由于以前上过一年的小学，所以学习进步很快，两年多一点就在高级班毕业。在扫盲老师的帮助下毕业后仍继续学习。两年后参加了银行的短训班，后来成了银行的出纳员。

王玉民，男，当时 30 多岁。解放前根本没有上过小学，^⑩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1952 年参加识字班，每天晚上学习 1—2 个小时。老师是村里小学的女教师。当时他的年龄较大，家里的活计又忙，经常缺席，初中没有考上。后来一直当农民。

李明生，男，当时 20 多岁。以前一字不识。私塾的先生当老师，每晚上 1—2 个小时的课。一个班里有 20 人，半数以上是女的。参加学习的人都是 20—30 岁左右的人，初级班毕业后上了中级班，但半途结了婚，并有了孩子。中级班只上了一年就不上了。一直当农民。

从上述的例子中可以看出，扫盲班分为初、中、高三级，不同级别的班都要经过考试才能毕业。虽然每晚只上一

两个小时，却是全年制教学。考试合格者发给毕业证书，凭这种正式的毕业证书可以升入中学学习。这些是在上面提到的1950年12月21日的《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和1953年11月24日的《关于扫除文盲标准，扫盲毕业考试等暂行办法的通知》中所明文规定的。^⑩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扫盲班毕业后多数人告别了农民生活，去从事其他的工作，其中有很多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

扫盲教育被人们所接受，并在学员中产生了相当的效果。其理由不外乎有这样两个。第一，由于根据水平分班进行扫盲教育，并进行长达3—5年时间的学习，加强巩固学习内容就自然地与其效果联系起来。第二，在当时有文化的绝对人数还很少，达到了小学毕业程度水平的人都可以成为干部、会计。因此，脱盲就很容易与提高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

在这里还要指出的是，1953年脱盲人数共为295万人，1954年是264万人。（参照图-1）

此后，中央政府把扫盲工作作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⑪，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并有组织地加强了领导工作。1955年10月24日教育部下发了《关于1955年冬到1956年春组织农民参加学习的通知》。^⑫这个文件，传达了毛泽东的《关于三种扫盲教材编写工作的指示》。为了将这个指示更加具体化，更加法规化，1956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

此外，到1956年3月，加入到初级农业合作社的农户达88.9%，到1956年末，高级社的加入率达到87.8%，已基本上完成了农业集体化。^⑬集体化的组织结构对群众扫盲

教育工作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然而，由于伴随而来的群众的积极性不断高涨，一旦集体化下的群众教育体制与群众积极性之间产生矛盾，教育的效果就会被削弱，也就产生了干部的强迫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危险性。

二、扫盲教育体制的确立

1956年3月29日中央政府公布了《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这个文件明确规定了半文盲的具体标准和扫盲对象。这个文件还强调，扫除文盲是中国文化上的一大革命，也是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极为重大的任务。在与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同时，根据当地情况，在5—7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并对扫盲教育中有关系的教师、教材、指导内容和指导方法等更为具体地做了明文规定。同时，在具体实施《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时，要求在各地教育部门、工会、共青团、妇联的领导下，政府机关、工矿企业、农业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等必须制定出计划，实施推广。

同时，扫盲工作的组织机构也发生了变化。1952年11月15日中央扫盲工作委员会成立后，扫盲工作已不单纯是一个教育问题，也被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来对待。1954年11月18日根据国务院的指示，该委员会同教育部合并，这样使其指导更为集中，加强了领导力度。自进入1955年后，扫盲工作同各部门各阶层各团体协同合作的趋势越来越明显。1956年3月15日，苏联式的全国扫除文盲协会正式成立。根据该协会的规则，会长、副会长由各个部门的领导担任，这充分体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

会长：陈毅（1956年2月成立的中央普通话普及工作委